

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①。“自幼”游历一下南洋就说“熟悉洋务”，固然是夸大其辞，但耳濡目染对商务并不陌生却是可信的。这样，郑观应就顺理成章地走上经营商务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扩大其视野，特别是在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想把中国置于富强之列的思想体系。

二、屈身买办与发展个人资本

一八五八年，也就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那一年，“小试不售”的郑观应，远离家乡，来到了上海。^②上海开为商埠虽只十几年，已是通商五口中最为繁荣的一个港口；在这里，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据点的洋行，已经林立了。在洋行中充当买办和工役者不少是香山人，其中就有郑观应的亲属戚友。郑观应到上海后，先寓居于他的叔父郑廷江处。郑廷江是英商上海新德洋行买办。郑观应本想进英文书馆学习英语，但为经济条件所限制，一个因“家贫服贾”，要“负米娱亲”的青年，不可能没有工资收入而去专攻英语。郑廷江帮助他解决了这一矛盾。郑观应一方面在叔父处“供走奔之劳”，以取得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郑廷江热心地教他英语。^③郑观应在新德洋行期间得以打下一定的英文基础，主要是郑廷江为他创造的条件。郑观应直至老年还是念念不忘他这位“秀山叔”。^④

郑观应到上海的第二年，即一八五九年，通过他的姻亲

① 见《待鹤山人事略》页二七。

② 有的著作中说郑观应到上海是一八六〇年，不确。

③ 见《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囑书》，民国三年排印本页一。

④ 同上书。

曾寄圃和世交徐钰亭、徐润等人的关系，被介绍到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第一流大洋行，徐钰亭、曾寄圃是这家洋行管总账的一等买办，徐润也已提升到徐、曾副手的地位。郑观应得到这几个人的揄扬，一进宝顺就取得一定的地位。

那时，英、法、美、俄等国不满足于一八五八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侵略权益，英、法正在再次燃起战火，阴谋把皇帝眼皮底下的天津开为通商口岸。外国商人急于了解天津的商业情况，宝顺洋行当然是不甘落后，派人前往天津调查那里的商情。一八五九年冬，郑观应跟随宝顺的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在津度岁后才返回上海。南方的青年，不增添衣服要过北方的隆冬，是比较艰苦的。郑观应在回顾当时刻苦的情况说：“在津度岁，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棉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励。”^①郑观应由此而得到了信任和重用。一八六〇年返沪后即在宝顺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等事宜。^②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郑观应一生工作和学习都是很勤奋的。这在宝顺期间就有明显表现。他在工作之余，约同广东同乡高要县的梁纶卿，一起到英国博士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课，专攻英文两年，郑观应通过这两年的英语学习，不仅英语基础更加坚实，且比较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那时，对郑观应说仍然是“贫读”，因为进外国人办的英语学校，要缴很高的学费，这对象他那样薪水不高每月一般只有十元或稍多一点的低级的洋行雇员是有困难的。因此，他只读了两年就停止了。郑观应曾慨叹地说：“可知当日贫读之难”！他后来训戒有优裕条件的儿辈说：“儿曹

① 《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囑书》，民国三年排印本页一。

② 同上书；又参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页六。

今日读书不需筹款，自应愤勉，无负光阴。”^①

郑观应根据切身体会，对学习外国语文非常重视。他虽然也说“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②，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通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郑观应说他跟傅兰雅学习英文时，就“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③了。可见他在那时已朦胧地意识到：通晓西文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改革社会以达到富强的工具的。郑观应在他后来所著《盛世危言》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④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并不是很得意的。他始终是管丝楼和揽载等事务。一八六五年以后几年间，由于洋行逐渐增多，竞争激烈，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等原因，宝顺的生意清淡，股东群起拆股，营业到处收束，处于一般买办地位的郑观应，也很不如意。徐润等人酝酿自开茶栈，郑观应也在自谋出路，例如一八六七年英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他即有资本投入并参与其事。一八六八年宝顺停业，郑观应也就失去了买办的位置。

从郑观应在宝顺十年的经历看，他的地位较低，不象徐润于一八六一年因曾寄圃死去而代替他当了副总买办。从起点看，徐、郑二人是有区别的。区别还不仅在于地位高低，郑观应于公余之暇，勤奋地学习英文等知识外，还很关心时局，从事著述。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局面，深感忧虑并有拯救国家的愿望。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开始辑著《救时揭要》一书。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是“触景伤时，略陈

① 见《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民国三年排印本页一。

② 同上。

③ 郑观应：《稟商条陈六弊请通飭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后编》卷八页三一。

④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利弊”之作^①。而徐润所关心的，不过是盈利和镇压太平军。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十年间不仅与中外商人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也与一些社会名流有交往。他除做买办分内的事务外，自己也开始做一些生意。出宝顺后，即当上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不久就与卓子和（国卿）一起承办了这个茶栈。和生祥茶栈的业务，主要是代两湖、江西以及徽州的茶客沽茶。茶栈的营业是好的。后来各帮茶客拖欠较多，累及营业的周转，郑观应等股东因恐欠款愈来愈多以致有倒闭的危险，主动于一八七一年停业^②。

郑观应在经营和生祥茶栈的同时，与怡和洋行买办商人郭甘章，以及他的姻亲唐廷枢等人一起，出资伙同外商经营公正轮船公司^③，并被外国商人士多达推为董事之一。这时郑观应还经营荣泰驳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名为华洋合营，但实际的权力操于外商，郑观应虽为“董事”并没有多少实权。郑观应等华商的投资，是被英商用来纳入它的侵略权益的轨道。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郑观应参与开办公正轮船公司虽有买办性的一面，但他从中却得到经营航务的经验，同时使他反对外商侵犯华商权益的心情也强烈了起来。

郑观应在经营和生祥茶栈和公正轮船公司的过程中，个人资本已有了相当可观的积累。他在和生祥茶栈停业后“腰缠十万上扬州”，当上了扬州宝记盐务总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盐务还是旧式商人经营的，这就表明郑观

① 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② 关于和生祥茶栈的停业时间，也有人说是一八七二年。

③ 公正轮船公司于一八六七年创办，航行于长江，要与旗昌轮船公司相抗衡。但由于资本仅有十七万两，实力不厚，对旗昌并不能构成威胁。一八七三年太古轮船公司创办时，以白银二十六万两购买了公正在长江的轮船码头等全部设备。这笔买卖郑观应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应又曾投资经营过旧式商业。

一八七三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原宝顺洋行气拉渡号轮船船主麦奎因，当了这个公司的总船主。麦奎因与郑观应在宝顺同事期间，就对郑很器重，这时他力请郑观应到太古总理一切。郑观应答应了，并参与了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一八七四年二月间，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三年的雇佣合同，受聘为太古的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郑观应在太古的权力是很大的，据他自己说：“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都归他和总理船务的美国人晏尔吉商办。他对办好轮船公司总结有十条经验^①，除用人得当外，最主要的是加速船运周期，降低消耗，多揽客货等三条。为了加速船运周期，应该运走的货物固然必须预先准备好，卸货上货的扛力和一切必要的设备也都要作充分的准备，以便船到不耽搁在码头上，而很快开航。为了降低消耗和运输费用，必须购置烧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式轮船。至于多揽客货，这是决定性的一环，郑观应为把这一环节抓好，他在太古的做法是：“选择熟识客商货多而可靠者，嘱渠分庄各口揽载，或加一九五用，或贴补房租，或货多准其荐一轮船买办，货至多者缺至优，以此羁縻，使其奋勉为我招徕。”^②由于揽载客货的一套办法行之有效，使客货两旺，船到即可及时装货，且无空船放回之虞。这就保证了船运周期的缩短，运输成本的降低。大大加强了在航运业中的竞争能力。由于经营得法，太古盈利多，发展快。郑观应得意地说：“当太古开办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公司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③由于郑观

① 这十条经验见《盛世危言·商务》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

②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盛世危言》五卷本卷三页一三——一五。

③ 同上。

应对太古轮船公司的贡献较大，故在一八七七年二月三年合同满期时，太古又聘请他继续干下去，续订了五年雇佣合同。

郑观应在进太古之前，已办有揽载行，进太古后，为了扩大营利并保证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货旺盛，又进一步在长江各口乃至沿海一些口岸，开设了主要为太古服务的不少揽载行。郑观应所办揽载行等商务机构主要有：长江各口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天津源泰揽载行，福州宝泰过载行等。在营口、牛庄、汕头等处开设“代客办货”的北永泰号，以在东北营口采买豆麦与豆饼等运往汕头、香港等处。北永泰也是对太古揽载业务有利的商号。此外，郑观应还开设了川汉沪仁泰昌杂货号和恒吉^①钱庄等商业和金融机构。

郑观应之所以要为太古揽载和经营，除由于他自己常说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思想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结合的。他在太古的年俸达七千两以上，额外分红要比这多得多。而他所开设的主要为太古服务的揽载行等商号的盈利，也是很丰厚的。此外，还有一些轮船买办对郑观应的报效费也不少^②。这就是郑观应卖力地为太古经营的主要原因。

追逐尽可能高的利润，是资产阶级本性，郑观应也不例外。而他把自己的利益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联系在一起，正是他买办性的表现。

① “恒吉”是根据郑观应：《致许君奏云书》，《后编》卷一〇页一一八。别的地方记载多写为“恒泰”。

② 我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光绪四年正月太古长江轮船几个买办送郑观应银两的“启事”一纸，原文如下：“启者，太古长江轮船上买办承郑陶斋兄照应多年，尚无寸报。兹因陶斋兄缴费不敷，每年每船自愿送还银几何列明于后，盖图章为凭。其银分四季付缴，决无异言。特立此据呈郑陶斋先生垂照。丁丑年正月吉日同人谨具。汉口轮船袁介堂每年愿帮银二百两正；北京轮船金雅泉每年愿帮银二百两整。上海轮船李乐斋每年愿帮银（无数字——引者注）；信懋轮船惠记棧每年愿帮银（无数字——引者注）。”